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及其现代性

凌建辉

摘要：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及其现代性，深嵌于现代中国思想转型与文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晚清小说虽然已经将现代战争纳入自身视野，但更多是将之作为“观念对象”而非“经验对象”来处理，为现代战争小说提供了观念前提。在“五四”之后的“非战文学”论争中，茅盾不仅强调“经验真实”的文学原则，更注重辨析战争的政治性质，在理论上确立了现代战争小说的基本框架。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在对民族主义战争小说与西方反战小说的双重超克中走向成熟，并在丘东平等七月派作家笔下获得了较为典型的文本形态，其现代性正体现为革命政治的历史诉求与个体生命经验之间的叙事张力。

关键词：现代战争小说；非战文学；茅盾；现代性

广义上的“战争文学”是对战争题材作品的宽泛指称，如胡亚敏给出的界定：“战争文学以某一次或几次战争为背景，描写战争中的军人、军队和战斗，或描写受战争影响和冲击的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也关注战争对战后社会生活的影响。”^①然而，这种题材学上的定义至多说明中国拥有悠久的战争书写传统，却忽视了古今战争形态和文学观念的根本差异。它不足以揭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特殊性，更难说明“战争”何以在现代中国超越一般性的题材范畴，成为一个需要被重新提出和界定的历史问题。

本文所谓“现代战争小说”，并非就题材意义立论，而是特指一种在现代中国形成的具有相对明确审美规范的小说类型。就其发生过程而言，它以晚清战争观的现代转型作为观念前

提，文体地位不断提升的“小说”则成为书写现代战争的重要媒介。但就其原生意义而言，“战争小说”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现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展开，并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战争小说虽然受到西方战争小说的影响，却并未循其路径发展，而是在本土历史语境中呈现出自身独特的生成逻辑。它既不断吸收西方战争小说对于个体经验与战争暴力的揭示，又始终深受国家、革命与民族危机等现代政治问题的规定，最终在丘东平等七月派作家笔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叙事形态。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战争如何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对象化，现代战争小说如何获得

① 胡亚敏：《战争文学》，第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自觉的类型意识,以及它如何在革命政治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持续拉扯中展开其现代性。

一、晚清小说与战争观的现代转型

讨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不能绕开晚清小说这一关键环节,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①,已经提示其特殊的历史位置。不过,晚清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已经产生了类型明确的现代战争小说,而是在外来战争冲击和进化论的共同作用下,“战争”从传统思想结构中脱离出来,转变为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现代问题。换言之,晚清小说真正完成的其实是战争观的现代转型,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提供了观念前提,使战争成为现代文学需要重新把握的对象。

当然,如果就题材宽泛而言,晚清时期的战争文学其实并不稀少。鸦片战争以来,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接连发生,频繁战争刺激并催生了大量以诗歌、散文、历史演义书写战争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末,阿英开始编纂一套近代战争文学总集,将这些作品加以搜集整理,并最终出版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等五种。这种以特定战争事件为单元的汇编直观展现了晚清战争文学的可观积累,后世学者对此的研究也大都受惠于阿英所提供的史料基础。

不过,这种丰富并不意味着现代战争小说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事实上,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创作在晚清也不发达。陈颖在《中国战争小说史论》中仅提及了《中东大战演义》《罌粟花》《死中求活》《救劫传》《洪秀全演义》等少数几部作品。^②李艳丽在《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中专门指出,构成晚清战争小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以日本为中介的翻译作品。据她统计,晚清本土创作的战争小说不过二十种,在繁盛的晚清小说中不过九牛一毛,同时期小说市场仍以侦探、写情小说为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小说“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以描写战争、战场、士兵为主的小说”,而更多是侧重战争背景的“社会小说”,对战争本身“基本上都没有从正面进行描写”。^③朱芯仪的近著《晚清“战争

叙事”研究》则深入考察了晚清小说围绕战争叙事所构成的域外翻译与本土创作两大脉络。她认为,晚清的域外战争小说翻译为本土创作提供了文学范式与书写参照,本土创作则基于时代需求对域外文本进行改写,反过来影响了域外文本的传播与解读。但这些作品大多过度强化了政治宣传与社会启蒙功能,聚焦于如何通过战争实现强国,极少对战争本身进行反思,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学审美性与思想多元性。^④

然而,晚清战争小说的整体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与现代战争小说的发生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其“不发达”正是晚清小说参与现代战争观建构的自然结果。晚清小说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作为经验对象的战争,而是作为观念对象的战争。换言之,它关心的并不只是某一场具体战争,而是晚清中国如何在近代危机中重新理解战争、想象战争并为潜在战争作准备。也正因如此,战争在晚清小说中并未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小说类型,在更多情况下仍以“兼类”或者作为叙事框架散落在时事、政治、科幻、国民、冒险等不同小说类型之中,作为一种观念对象承担了晚清社会对危机、竞争与国家前途的想象。

晚清战争观变化的关键,在于晚清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了传统天命论和天下秩序的解释框架,转而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视野重新理解战争。在传统思想结构中,战争本质上是天命意志在人间政治的展开,其历史意义在于以暴力手段恢复或重建道德秩序。古典历史演义便是这种战争观的鲜明载体,其叙事重心通常不在战争本身,而是借战争确认王朝正统,并服务于天命转移的合法性论证。但随着甲午战败的观念冲击,进化论迅速成为晚清知识界理解现代世界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一认知结构下,现代战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参见陈颖:《中国战争小说史论》,第20-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③ 李艳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第8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④ 参见朱芯仪:《晚清“战争叙事”研究——译介、图像、新小说》,第464-468页,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

争被重新界定为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不可避免的生存竞争,相应地,战争观也在主体、逻辑与价值三个层面发生了重构:战争主体由“家天下”的王朝转向现代国家,其运行逻辑也不再系于道德天命,而体现为国家力量的整体竞争,其价值则被赋予种族进化与文明跃升的历史意义。

在此意义上,晚清小说所关注的战争与其说是具体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如说是一种贯穿平时与战时、内部与外部的总体竞争机制。正如严复所言:“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从衡之际。”^①战争其实早在战端开启之前便潜伏于科学技术、国民精神和制度能力的国家全面较量之中。于是对晚清知识分子而言,战争首先唤起的已不再只是暴力冲突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现代政治问题:国家能否自立,科技能否制胜,制度能否富强,国民能否尚武,种族与文明能否在世界竞争中存活。晚清小说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以分散而多元的文学想象参与了这一现代战争观的建构。如《波兰镜》《瓜分惨祸预言记》《英德战争未来记》《未来战国志》等小说通过对潜在战争危机的想象推动了国家主体意识的形成;《新舞台》《秘密电光艇》《电世界》等科幻小说强调科学技术与军备制造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旅顺实战记》《少年军》《橘英男》《女露兵》等小说进一步把战争理解为国民精神力量的总体竞争;《新纪元》《黄人世界》《狮子血》又通过“黄白合战”和殖民虚构赋予战争以种族进化和文明跃升的历史意义。当然,晚清小说也并非一味肯定这种竞存逻辑,《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枕戈记》《四日》等翻译作品已经开始从技术异化、战争创伤与个体感受出发对现代战争提出反思。正是在这些彼此交错的文学书写中,“战争”才逐渐从传统叙事中的事件背景,上升为组织晚清政治想象、历史焦虑与现代国家观念的中心问题。

这种将战争处理为观念对象的方式与晚清小说的文体功能密切相关。晚清小说并不是在审美自律意义上获得了新地位,而是作为思想变革的配套启蒙工程被提出。随着进化论对文

学观念的重塑,小说在“小说界革命”中被抬升为“文学之最上乘”,被赋予“新民”“救国”的社会功能,^②并成为传播新观念、建构社会想象的重要文体。在这种强烈的工具主义逻辑下,战争进入晚清小说,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审美或经验对象,而是意味着小说开始承担起解释战争、想象战争与动员国民的任务。作家们并非追求表现战争经验的文学自觉,而是服从于政治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宏大诉求。林纾在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时期望国人能将其“代兵书读之”^③,《橘英男》的译者也强调要引之为“吾国军人之鉴”^④。在此意义上,晚清小说通过虚构故事把抽象的“竞争”“进化”“生存危机”转译为可感的情节、人物与环境,使读者得以在小说中进入现代战争的认知框架,而不同的小说类型也各有侧重地参与了晚清战争观的建构。因此在晚清小说中,战争是一种承担启蒙与动员功能的观念对象,而非有待深入表现的经验对象,战争书写也因此难以脱离政治教化目的而获得自足的审美形态。

与这种文体功能相对应的是晚清战争书写在经验层面的外部性。现代战争小说往往以视角内转为重要特征,即深入个体在战争中的身心感受和创伤经验。但晚清小说家多为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与真实战争经验之间存在客观隔膜。这种经验的缺席使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沿用传统历史演义体例,或如任增霞所言采用“时事小说”^⑤进行战纪式记录,抑或如前所述将战争拆解为不同政治议题,并以粗线条的方式加以推演和想象。他们往往擅长借战争言说国家、种族、科技和未来等各种现代性话题,而

① 严复:《天演论》,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马勇、黄令坦点校:《严复全集》第1卷,第108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②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11月第1号。

③ 林纾:《〈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序》,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林纾译文全集》(2),第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④ [日]枫树居士原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橘英男》,第1页,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⑤ 任增霞:《晚明与晚清时事小说研究》,第166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

不擅长将战争落实为对战场、士兵和主体经验的描写。因此,现代战争虽然已经进入晚清小说的表现范围,其时却仍难以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战争文学作品。

由此观之,晚清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是战争观的现代转型与小说类型成熟之间的错位状态:一方面,战争从传统思想结构中的附属事件,上升为晚清理解现代世界与生存危机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启蒙任务与经验限制,战争在这一时期仍主要以想象、议论和推演的方式进入小说,尚未下沉到个体经验之中。概言之,晚清小说虽然完成了战争观的现代转型,使战争成为现代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却未能提供成熟的文本范例。由此留下的关键问题是,当战争从观念对象被落实为经验对象时,现代文学应当如何表现战争经验。在这一背景下,五四时期围绕“非战文学”的讨论不仅是反战立场之争,更是一次关于现代战争小说何以成立的理论探索。

二、“非战文学”与茅盾的战争文学理论建设

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思想语境中,19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与资本主义文明被视为中国社会进化的楷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中国国内的共和危机使西方的现代性模式陷入了危机。以杜亚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敏锐指出,一战并非偶然的历史灾难,而是19世纪西方以“权利竞争”为基础的旧文明的必然产物。这种残酷的竞争逻辑在欧洲表现为国家间的大战,在中国则以军阀混战为缩影。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西方物质文明弊端的揭露,以及陈独秀提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①的论断,共同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崇拜态度的动摇。伴随西方现代文明神话的破产,中国思想界对“战争”与“进化”的认知发生了价值转向。进化论所承诺的通过生存竞争以实现文明进步的乐观主义宣告破灭,战争不再被视为推动历史进化的合理手段,而是被诊断为需要反思和克服的旧文明病症。在这一背景下,

五四新文学作家拒绝沿用晚清的国家主义和竞争逻辑来表现战争,而是强调从个体真实经验出发揭示战争的压迫性和破坏性。正是在这种从宏观视角转向个体生命感受的过程中,现代战争文学开始获得新的理论标准。

在现代战争文学的理论建设中,杜亚泉于1915年发表的《战争与文学》是一篇具有预见性的理论文献。杜亚泉观察到,随着现代战争性质的转变,“近世战争文学”的叙事焦点已经从王侯将相转移到了战争本身,战争不再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宏大舞台,而是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现实对象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他指出:“虽一负伤之兵,一俘虏之卒,一尸骸,一马骨,皆足以抒写感情,与大人物有同等之价值。”^②这一观点将个体的微观体验提升为战争文学可以正面表现的重要内容。此外,杜亚泉还指出了其审美基调的变化。他认为,面对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杀戮,现代战争文学已不再是宣扬武功的“鼓吹的文学”,而是成为“镇静的文学”,其情感效果以表现忧愁惨痛为主。这种试图通过描写战争酷烈来“防遏非人道的战争”的主张,无疑构成了日后“非战文学”诉求的先声。^③

杜亚泉的前瞻性判断直到一战后欧洲战争文学大量输入中国之后,才获得了更为清晰的体现。对这些外国文学的译介和讨论为五四新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这些作品不再以国家、民族和历史大局为中心,而是转向战壕生活、个体感官和精神崩溃,强调战争对于生命的压迫性。正如西方学界对一战文学的研究所揭示的,西方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本质上是一场“经验与再现的危机”,因为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已远远超出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能力。伊夫林·科布利(Evelyn Cobley)指出,一战战壕中被惨烈悲剧反复打断的极端体验彻底击碎了19世纪小说根植于启蒙主义的进步叙事,技术化的大规模屠杀、个体在战争中的无力感以及战场体验的无意义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现实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1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②③ 佘父:《战争与文学》,《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5号。

主义向前推进的情节动力,迫使战争叙事转向碎片化书写与反高潮结构。^①伯纳德·贝尔贡齐(Bernard Bergonzi)也指出,英国一战后战争小说与传统战争小说存在本质区别:工业化屠杀让传统英雄主义的神圣性和史诗性荡然无存,战争只剩下恐怖与荒诞;战争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从英雄与精英转向平民与士兵;价值立场则从歌颂战争转向反战批判。^②正是这种以视角内转、英雄消亡和个体创伤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战争文学范式,构成了20世纪20年代“非战文学”的创作参照,也为茅盾战争文学理论的展开提供了重要背景。

彼时中国虽未沦为一战的主战场,但连年酷烈的军阀混战使五四作家与世界反战文艺思潮形成了思想共振。战争不再被置于国家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之中,而是被书写为一种作用于普通个体的极端暴力。它深入身心感官、破坏日常生活并成为现代主体难以承受的创伤经验。正因如此,个体的战争经验及其真实性成为衡量战争文学的重要标准。而茅盾在1924年“非战文学”论争中对创作者经验的反复强调,正是试图将这一标准明确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基本要求。

1924年夏,郑振铎主持的《小说月报》连续推出两期“非战文学号”,第一次将“非战”集中塑造为一个公共的文学议题。专号既刊载了安特列夫《红笑》、巴比塞《廊门》、迦尔洵《胆怯的人》等外国文学作品,也载有如王思玷《一粒子弹》、蒋用宏《梅岭上的云烟》、台静农《途中》、许杰《惨雾》等大量新文学创作。第七期的《卷头语》有意引导读者把目光集中在兵匪、伏尸、难民、破碎家庭与乡村废墟之上,希望通过这些“惨目的图画”^③去激发读者的厌战情绪。从这一角度看,“非战文学”依赖的是一种以平民受难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叙事模式,战争被还原为施加于平民与乡村社会的暴力灾难。但也正因为过于强烈的人道主义诉求,“非战文学”的局限迅速暴露出来。方舟指出,受制于命题征文的机制束缚与作者真实经验的匮乏,专号多数小说均暴露出“以理造事”^④倾向,即先预设“非战”结论,再强行编织情节予以证明。战争在小说中更多是可供谴责的灾难,而没有体现出战

争经验的复杂性。最关键的是,这种人道主义反战表达很快遭遇现实政治的压力。在1924年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和帝国主义压迫并存的历史语境中,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态度显得无力含混。于是,围绕“非战文学”展开的争论很快从初期“文学能否止战”转向“非战”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民国日报·觉悟》的撰稿群从政治与阶级角度反对笼统“非战”。许金元指出,在半殖民地中国高唱绝对非战无异于服食阻止国民革命的“麻醉剂”^⑤。味辛讥讽那些“思想笼统的中国文人”一见“战”字便像雨后蛙鸣般高叫“非战”。^⑥魏金枝强调要区分“从那些私人的手里夺其所有到这些私人的手里的战争”与“从那些私人的手里夺其所有到民众的手里的战争”,并据此指出真正应被“非”的是前一种压迫性战争,而不是后一种指向民众解放的战争,并且批评“非战文学”徒然陷入感伤主义。^⑦随着《中国青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反对战争而革命”^⑧的口号,“非战”的普遍伦理在革命政治的现实逻辑中被瓦解。而正是在这种要求辨析战争政治属性的现实压力下,茅盾的特殊性才显现出来。他并未停留于人道主义的感伤谴责,也未简单接受革命的政治理性,而是试图为战争文学寻找一种既能容纳真实经验、又能回应现实历史的表达方式。

茅盾对战争文学的理论自觉在于他试图把文学真实性与战争的政治属性同时纳入现代战争小说何以成立的问题之中。他最先批评的

① Evelyn Cobley, *Representing War: Form and Ideology in First World War Narrativ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pp.127-131.

② Bernard Bergonzi, *Heroes' Twilight: A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at Wa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0, p.222.

③ 西谛:《卷头语》,《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7期。

④ 方舟:《新文学通俗问题研究:1917—1927》,第144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23。

⑤ 许金元:《论非战文学和非战思想(下)》,《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8日。

⑥ 味辛:《非战!》,《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1日。

⑦ 魏金枝:《非战文学的原理与革命》,《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9月21日。

⑧ 晓柳:《非战与革命》,《中国青年》1924年第48期。

正是当时“非战文学”中大量停留于伦理控诉与表层感伤的作品,直言这些小说“十之九不是亲身经历的记录”,其故事不过来源于逃难传闻、医院伤兵或电影情节的材料拼凑,只能算“僭称了战争小说的名儿”。^①茅盾明确要求,战争小说不应满足于“开火”“壕沟”“冲锋”之类外在名词,也不应只写“抢劫”“奸淫”等司空见惯的战争罪恶,真正的战争小说必须能写出战争侵入身体、感觉与意识的过程,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立场先行的道德证明。但茅盾并未退回一种纯粹审美主义的真实观。相反,他对“真实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政治祛魅意图。在《欧战十年纪念》中,他指出各民族无产阶级是受资产阶级诱骗才成千万走上战场送命,他们的流血不仅没有如理想中那样“洗净这个世界”,反而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巩固既有统治。^②茅盾尤其把批判锋芒转向大战中的知识阶级与文学家,指出这些平日鼓吹和平、正义与人道的人,到了战争爆发时却完全露出本来面目,帮助统治阶级诱骗无产阶级充当炮灰。虽然他承认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反战人士是大战中的精神独立者,但战后世界并未因他们变得更好,帝国主义扩张反而更加紧迫,所以单纯呼吁“非战”并不能真正消弭战争,反而会“蒙蔽了大众对于国际战争真正意义的认识”。^③他提出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自己而战”^④,才可能终止世界永久的扰乱。在茅盾这里,战争文学的“真实性”从来不只是经验问题,同时也是揭露谁在制造战争、谁在为战争辩护、谁被迫充当牺牲者的问题。

在坚持经验真实与辨析战争政治性质的双重要求下,茅盾的理论探索呈现出内在张力。一方面,他在《非战文学杂谭》中从神话时代的《伊利亚特》谈起,有意识地拆解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对战争的美化,坚持从平民、妇女与战败者的受难处境来理解战争。^⑤他对黑炎《战线》的激赏也主要基于作品对士兵日常生活的逼真描摹,以及书中“没有一个‘英雄气概’的人物”^⑥的去英雄化写法。另一方面,他始终要求将战争放回具体政治结构之中加以辨析,这体现为他对欧洲战争文学的译介与取舍。他推重巴比塞、拉兹古等能够揭露战争性质的文学

家,认为巴比塞《火线下》不同于其他战争小说之处,正在于提出了“唯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终止帝国主义的战争而确立人类间友爱关系之唯一的大路”^⑦的重要问题。而拉兹古的《战中人》在1917年就揭示了欧洲战争的非正义性:“富人靠战争发财,穷人去送死。”^⑧由此可见,茅盾在现代战争小说生成过程中的中介性意义,正在于他试图建立一套关于现代战争文学的判断框架,既要保留文学对个体生命的细致体察,又要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视野中辨析战争的政治性质,从而在个体关怀与革命政治之间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提供最初的理论基础。

三、民族革命战争与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现代性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乃至全面抗战的爆发,战争经验以高度切近而持续的方式进入中国作家的现实生活,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也面临从理论建设走向文体实践的严格考验。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作家面对着两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战争叙事路径:一是以黄震遐、万国安等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战争小说,二是一战后西方现代战争小说所提供的反战范式。中国现代战争小说正是在对这两种路径的超越和克服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现代性形态。

民族主义战争小说的共同特征是以民族危机为中心重新组织战争叙事,意在反拨20世纪20年代“非战”思潮中的厌战心理与反战取

① 茅盾:《现成的希望》,《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4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②④ 茅盾:《欧战十年纪念》,《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456、4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③ 茅盾:《非战的戏剧》,《茅盾全集》第二十卷,第5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⑤ 参见茅盾:《非战文学杂谭》,《茅盾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⑥ 茅盾:《黑炎的〈战线〉》,《茅盾全集》第二十卷,第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⑦⑧ 茅盾:《欧洲大战与文学》,《茅盾全集》第二十九卷,第48、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向。民族主义文艺阵营认为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富有兴奋刺激性的战争文学”^①，因此1931年黄震遐《陇海线上》发表之后就被迅速推举为可以与《西线无战事》相抗的“主战”的战争小说。与此同时，这类作品并非纯然建立在空洞口号之上。黄震遐、万国安都有过从军经历，前者的《陇海线上》以中原大战为背景，带有很强的自传性和实录色彩；后者的《国门之战》则在战斗书写上具备写实品格。虽然民族主义战争小说在政治立场和书写内容上存在严重局限，但它毕竟试图把战争拉回到紧迫的民族生存语境，并以“英雄”“尚武”“奋斗”等话语赋予战争以合法性。

在左翼批评者看来，这类民族主义战争小说的根本症结，正在于它虽然以“民族危机”为名重建战争叙事，却并未真正把民族解放与民众生存置于中心，反而把军阀混战、对内“剿匪”乃至进攻苏联包装为“为民族而战”的正义事业。瞿秋白抓住《陇海线上》将白俄雇佣军比作法军在非洲的“客军”这一细节，指出其暴露出以本国民众为敌的殖民性和猎杀性。^②鲁迅则从更宽的政治结构上指出，这类民族主义文学表面上鼓吹救国，实则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宠犬派文学”，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替统治者动员、替暴力涂抹正当性的修辞。^③茅盾也认为这些小说对真正的帝国主义不敢置一词，《国门之战》以谣言、仇恨和嗜血书写来渲染反苏战争，《黄人之血》更是滑向“大亚细亚主义”，他们笔下的民族主义实为彻头彻尾的“奴族主义”，^④其结果并不是民族解放，反而是使民族主义叙事沦为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附庸。也正因此，冯雪峰才会提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必须同时给予这类抽空了战争真实、徒具躯壳的伪作以“无情的打击”^⑤。如果战争的领导权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么民族主义战争小说越是热衷于歌颂英雄、牺牲与战斗，就越容易把本应指向民族解放的战争，偷换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民族主义战争小说的局限表明，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不可能仅仅依靠主战立场或民族主义激情来完成自身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作家能够直接借用一战后西方现代战争小说的经

典范式。后者固然以反英雄叙事、个体视角和无意义感深刻重塑了现代战争书写，但它所对应的是欧洲战后一代的幻灭与迷惘，而非中国现实的民族危机与革命运动。正因如此，西方现代战争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生成的另一重要参照。

对中国读者而言，西方现代战争小说中影响最大者无疑是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罗执廷指出，这部小说在1929年引入中国之时就引发“抢译”现象，到1936年至少已有五个中译本，并被迅速改编为话剧、电影，形成罕见的跨媒介传播热潮。^⑥就接受广度和社会反响而言，它几乎构成了中国读者理解“现代战争小说”的典范文本。正如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所指出的，《西线无战事》所提供的不仅是反战主题，而是一种现代战争书写方式：“战争是个体体验问题，不是集体阐释问题。”^⑦小说所呈现的与其说是战壕现实本身，不如说是战后一代关于战争的感受、迷惘和精神创伤。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而言，这种贴近前线个体经验、揭示战争创痛并具有鲜明反战立场的书写方式，无疑代表了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战争小说样式。

然而，这一样式在中国并未被原样接受。随着民族危机加剧和革命政治的风起云涌，无论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还是国民党阵营都不能容忍《西线无战事》的“非战”立场，认为其消极倾向将有损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茅盾

-
- ① 《编辑的话》，《前锋月刊》1931年第1卷第5期。
 - ② 瞿秋白：《狗样的英雄》，《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一卷，第3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③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④ 茅盾：《〈黄人之血〉及其他》，《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2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⑤ 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冯雪峰论文集》（上），第77-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⑥ 参见罗执廷：《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与民国时期的非战/尚战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 ⑦ [加]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李晓江译，第4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延续其 20 世纪 20 年代的立场,称其为“屠伯们的半个笑脸”^①。而抗战结束后胡风的表态最清晰地概括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立场:“《西线无战事》写了反动战争的残酷性,本质上并没有超过消极的界限,而我们是神圣的人民战争,我们的作家所写的是人民的艰苦的奋斗,英勇的气魄,以及创造的精神。在基本的思想意义上,我们是可以向雷马克骄傲的。当然,已有的成绩并不能够满足历史的要求,伟大的战争所创造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还在要求着艺术上的反映,但雷马克却决不能成为我们作家的目标。”^②这一立场表明,在面临民族危机的现代中国,战争小说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在反讽中走向幻灭和虚无,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战争小说创作经验的同时,重新确立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和伦理意义。也正因此,中国现代战争小说虽然同样触及战争对身体和精神的压迫,却并未全面走向西方战后那种以幻灭和解构为归宿的叙事方向。相反,“抵抗”与“革命”的现实诉求重新为战争叙事注入了强烈的情节动力,使作家不得不在形式内部重建历史的连贯性与行动的意义。正是在反思战争暴力与坚持民族抵抗合法性的双重要求之中,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展开了自身的现代性。

根据徐文广的梳理,抗战全面爆发后,解放区、国统区、东北以及流亡作家群体都开展了充分的战争小说创作。但总体而言,其创作仍存在功利性压倒真实性、叙事模式雷同、人物塑造扁平化、审美基调乐观化和叙事表达失衡等缺陷,而像巴金、老舍等文学大家由于缺乏真实经验,其战争题材创作也多不成功。^③相较之下,以丘东平为代表的七月派把民族革命战争转化为一种更具复杂性和真实性的文学经验,是中国现代战争小说趋于成熟的典型样本。

丘东平的创作之所以标志着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成熟,并不只是因为他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更接近真实战场,而是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语境中,把“英雄主义”从口号化和传奇化的表达中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经由失败、痛苦、恐惧与自我克服而生成的现代主体经验。借用倪伟的概括,这是一种“精粹的英雄主义”^④。从丘东平的战争书写出发,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现代性

既不体现为对西方反战文学范式的简单效仿,也不是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狂热颂扬。它并不回避战争的惨烈、失败与人性幽暗,而是在直面现实战争经验的过程中重新确认革命主体的价值,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正当性与个体感性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紧张的叙事结构。

这种现代性其实可以从七月派整体的文学主张中得到说明。胡风在《七月》发刊辞中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文艺既要真切反映“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又要“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⑤在《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中,他又提出文艺应帮助“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永生”。^⑥这表明七月派首先确认的是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但这种确认并不意味着取消战争文学表现压迫、痛苦与创伤的权利。胡风反对政治向作家笼统地要求“光明”,主张文学应当“写出生活的真实”,因为现实内部本就存在“健康的力量和黑暗的力量”的斗争。^⑦阿垅则把战争文学的创作困难归结为“真”,而“真”归根到底就是“生活”——“仅仅是生活,也必须是生活”,即使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解放的战士”,在刺刀见血的瞬间,心上也仍会“浮出来一种异味”。^⑧丘东平则把这一立场推进得更具体。面对苏联同志对抗战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疑问,他一方面要求作家先去“认识中国民

- ① 茅盾:《战争小说论》,《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 228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② 胡风:《冬夜短想》,《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382 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 ③ 参见徐文广:《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创作论》,第 110-114 页,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 ④ 倪伟:《延伸的战场,“精粹的英雄主义”——全面抗战初期七月派的战争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 年第 8 期。
- ⑤ 胡风:《愿和读者一同成长》,《胡风全集》第 2 卷,第 499 页。
- ⑥ 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胡风全集》第 3 卷,第 184 页。
- ⑦ 胡风:《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胡风全集》第 2 卷,第 520 页。
- ⑧ S.M.:《真——关于战争文学》,《七月》1941 年第 6 卷第 3 期。

族怎样地在战斗”^①，认识到“受难，是为了革命，而当革命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时候，是为了抗日”^②，从而把战争书写建立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方向之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是否接近生活，更在于是否具有“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③，能否在主观上真正理解民族革命战争的现实。可见，七月派其实将战争文学界定为一种既服从民族解放方向、又必须如实承受主体战争经验的文学形式。

尤其在丘东平这里，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现代性获得了最为集中的体现。无论是被胡风誉为中国抗日民族战争“雄伟的序曲”^④“最壮丽的史诗”^⑤的《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对正面战场的描写，还是《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多嘴的赛娥》《茅山下》对后方社会、乡村空间和根据地生活的展开，丘东平笔下的战争不只是前线的军事冲突，而是一种全面侵入人的身体感官、心理状态和生存处境的总体性经验：前线有炮火、饥饿与溃败，后方则有轰炸、流亡、恐怖以及战时化的日常生活。同时，出于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丘东平也把批判的目光投向军队组织与社会动员机制的缺陷，对现代战争下国家、社会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审视。而更重要的是丘东平努力塑造的革命主体形象。其未竟的长篇小说《茅山下》通过周俊与郭元龙之间的思想矛盾和性格冲突，深刻揭示了革命对于人的完成意义。战争诚然是“血的严重的邀请”^⑥，它迫使革命者以流血牺牲投入集体事业并改变自身。但这种牺牲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根据地生活和军民联系中被赋予了切实的集体归属感。小说描述新四军在战斗中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被“亲挚地称为自己的队伍，而且叫自己也成为这队伍的一个”^⑦。于是，民族革命战争成为革命主体自我重塑的历史契机：“战争将令人们提高自己，使他们骄傲而自尊。”^⑧在此意义上，丘东平笔下的人物既不是空洞的民族英雄，也不是被战争彻底击垮的受难者，而是在战争压力、纪律约束与自我磨砺中被艰难锻造出来的现代革命主体。他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正当性、战争对个体生命的严酷压迫以及革命主体在战争中

的艰难生成同时压缩进了战争叙事之中，从而使中国现代战争小说摆脱了浅表鼓动与单向幻灭，获得了更具民族质地的现代性形态。

结 语

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并非古已有之的战争书写在现代的自然延续，而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叙事形态。它的生成既以晚清战争观的现代转型为观念前提，也离不开“五四”以来围绕战争经验、文学真实性与革命政治的理论探讨。换言之，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过程，其实正是“战争”在现代中国被重新理解、重新对象化并进入文学表现中心的过程。也正因此，中国现代战争小说不能被宽泛地理解为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而是现代中国对战争问题的特殊处理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战争既关乎国家存亡与革命实践，也深刻作用于个体的身心感受与生存抉择。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现代性并不单纯指向经验真实或反战立场，而是形成于两种要求的持续张力之中：既要说明为何必须进行战争，又要说明战争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由此，中国现代战争小说最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战争小说的现代性形态。重新考察这一生成过程，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历史特质，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在战争、革命与个体生命的交错中展开自身复杂而独特的现代性。

【作者简介】凌建辉，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①② 丘东平：《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答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丘东平作品全集》，第680、68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③ 丘东平：《并不是节外生枝》，《丘东平作品全集》，第686页。

④⑤ 胡风：《忆东平》，《胡风全集》第3卷，第344、346页。

⑥⑦⑧ 丘东平：《茅山下》，《丘东平作品全集》，第461、462、462页。